



新观察

“打工诗歌”的兴起与精神特征

□柳冬妩

新世纪以来，“打工诗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我认为，对于“打工诗歌”的概念，不必作出过于严格的界定。从本质上说，“打工诗歌”是诗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题材领域的拓展，是过渡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乡村与城市相冲突的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打工诗歌”最先出现在广东，就是因为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幅度较大、经济生活最活跃的地方。“打工诗歌”只是一种观察角度，不必勉强作为流派解，更不必以这个概念为限，自设樊篱。一首优秀的诗歌，难以被任何命名所框定。基于将心比心的理解与感悟，我所理解的“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与“农民工”一样，都是需要打引号的概念。

“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最近十多年来，仅在广东的“农民工”中，就走出了谢湘南、张绍民、郑小琼、程鹏、许强、张守刚、刘大程、孙海涛、池沫树、曾文广、刘洪希、罗德远、阿鲁、蒋明、蓝繁等一大批“打工诗人”，其中有五人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翻开最近十几年“青春诗会”的入选诗人名单，有相当一批诗人参加时都还没有脱离“农民”身份，他们虽然仍是农村户口，但已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耕作者，在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更多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走，兼具着农民、民工、小商人等多重身份，他们的写作不可能忽略工业时代这个大背景。“打工诗人”新生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融之中，在两种文化撞击中启动了艰难的行程，他们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漂泊与歌唱。他们都是辛酉笔下的“鸟人”：

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黄土地的人/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奉献汗水，挥洒青春/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像是走在异乡的人/我们这些两栖的人/我们这些两栖的人/我们这些中间人/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腊月底的火车站台上/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春意浓浓的正月里/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鸟人”

2003年，我在一个诗歌论坛上读到辛酉的《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有一种意外的惊喜，立即把这组诗中的《我们这些鸟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了》引为“打工诗歌”批评文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徐敬亚等十多位评论家从我的评论中转引了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它还被收入了吴义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本）。《我们这些鸟人》最感人的因素，是因为它成功地传达出打工者身份未定的隐忍和焦虑。“打工诗人”的吟唱表达了对夹杂在乡村与城市、家园与异乡之间的情感体验，在这种纠葛中所作的徘徊、游移，甚至心

灵的挣扎。“打工诗人”是一群保留农村户口的城市浪子，是都市里的“农民”，是在异乡的暗夜里寻找爝火的浪子，他们努力在城市的丛林里寻找道路。2010年，《诗刊》与《星星》联合评出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大多数都属于“打工诗人”，是“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如唐以洪、尤克利都发表过不少“打工诗歌”作品。《星星》诗刊还于2008年举办了首届农民工诗歌大比赛，获奖者也以“打工诗人”居多。与主流诗歌刊物相对应的是，2001年一批“打工诗人”努力克服官本位、钱本位的压力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打工诗报《打工诗人》，并迅速成为“打工诗人”诗作的集结地，第一次将分散各地的“打工诗人”汇集军威，使处于零散、贫血和孤单的“打工诗歌”写作得到了整合。《打工诗人》们不仅编辑出版了自己的诗报，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和《与一棵树进城——握手农民工诗歌选》，使“打工诗歌”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为一种先在命名找补对应现实，进行成功的呼应。这些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打工诗人”，把个人体验过的生存与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联系起来，写出“打工诗歌”，是他们的使命。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他们的诗歌惟一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打工诗人”自身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

“打工诗歌”写作，也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尽管“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是相关密切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等同，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位“打工诗人”的创作生硬地归结为“打工诗歌”范畴。打工者所写的不一定就是“打工诗歌”，他可以写出“打工诗歌”，非打工者也可以写出“打工诗歌”。虽然“打工诗歌”主要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但是当“打工”进入了其他诗人的写作视野和意义世界时，这样的经验化入他们的感觉结构中，他们也无法忽视它的巨大存在。不管是“打工诗歌”，还是其他的“底层写作”，都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的“打工诗歌”评论中，曾大量引用一些“非打工诗人”所写的“打工诗歌”，比如老刀、宋晓贤、卢卫平、江非、方舟、世宾、阿斐和王顺健等人的作品。伊沙的《中国底层》、江非的《时间简史》、宋晓贤的《乘闷罐车回家》、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林雪的《蹲着》等作品，已经成为“打工诗歌”中的名篇佳作。以诗性的方式处理打工题材，这些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体现了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但除卢卫平、老刀外，其他“非打工诗人”创作的“打工诗歌”在他们的整体创作中所占比重较小。总体而言，在“打工诗

歌”创作中，“打工诗人”占据了主导地位。

面对“打工诗歌”，尤其是“打工诗人”所写的“打工诗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很难知道它们的生活真实、内心真实和写作真实。我们不能小看“真实”一词的分量。对于“打工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什么就该说出什么。“打工诗人”的“打工诗歌”作品都是与他们的生存处境相关。他们首先经历的就是经历——身体的经历或者内心的经历。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从身体出发，具有最为内在和最真实的“身位感”，但又不囿于身体。她书写身体，又通向灵魂，延展到整个世界。她的诗歌出现大量的“身体”“肉体”“躯体”，还有“他们的脸、手、腿”，“缓慢起皱的皮肤、骨头、毛发”。郑小琼的诗歌与身体的联系十分紧密，身体的印痕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比比皆是。比如：“它抓住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我的头发，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器”（《抓住》）；“承受着我肉体与灵魂的五金厂/我看不见自己像一块薄薄的铁片”（《雨水》）；“铁块与胶片抚摸着她命运的暮色/嘴吐的机床断残的食指交颈默立/她命运的暮色在一个流离的词语哭泣/她血肉模糊的疼痛询问着命运”（《黎明》）。郑小琼把生活的荒诞、阵痛和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身体的内在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肉体与灵魂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郑小琼诗歌中的身位感与诗人的现实处境构成互文联系。郑小琼用诗歌正视和收藏自身的苦难、愉悦、不安、败坏、幸运、秘密和瞬间……诗歌就像身体的器官，恰如其分地散布在理所应当的位置。另一位“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谢湘南，他的写作根基也在于其对个体生存中身体被围困、被捆绑的敏感。谢湘南的写作与这种身体不自由的郁结有关：“我发觉自己被锁上镣铐/在一台彩电的后座里/长眠”，“这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屁里出来——成为一个椭圆形的塑胶玩具”，“我像那冒烟的机器”（《前沿轶事》）。“打工诗人”在生存中写作，他们深入身体的深渊，在生命的战栗中，把它的不安、颓废、兴奋和热情转译出来，给历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表达，发现和认识了一个时代的身体真相。“打工诗歌”是对身体性感知的经验命名，是对生存现场原声的应答和照看，是对生存个体的身体性感受与经验性的真表述。

本质意义上的“打工诗歌”，不应该理解为是那种表面上写打工题材的诗歌，更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精神概念来理解。每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和一个秘密的精神世界相通。阅读“打工诗歌”，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精神磁场”的存在，漂泊不定、失业恐慌、生存挤压、崇高与卑微、尊严与耻辱、憧憬与幻灭、忍耐与愤恨、痛苦与伤悲、歧视、恐惧、屈从、挣扎、怜悯、反叛、焦灼、内心的自我抗争，等等。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学问等都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交流而获得，可以像钱币那样流通、像瘟疫那样传染，但体验无法偷换、抹杀和替代，而且无法复制和模仿。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

■主持人的話

不管“打工诗歌”是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作为“潮流”，却是我们在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时所难以忽略的。我个人认为，无论我们在诗学和美学上如何看待“打工诗歌”，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打工诗歌”的发生、发展和它们在现有的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处境，作为一种精神表达，我们的学术界和批评界确实应该对它高度重视。“打工诗歌”有它自己的题材取向、情感体验、精神特征和话语立场，有它自己的代表性诗人、代表作品和它自己的批评家，还有自己的传播媒介与社会支持……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深入研究。作为一位“打工诗人”和较早产生社会影响的“打工诗歌”批评家，柳冬妩的文章不仅呈现出“打工诗歌”的丰富现象，揭示了“打工诗歌”的精神特征，还在“打工诗歌”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对它作了新的审视，有些观点，很值得关注。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打工诗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形状，个人经历和个人经验是影响他们诗歌写作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把最简陋的打工生活和盘托出，注重了对内心的内在体认。“第一排的第一个人/歪在靠椅上/睡着了/第二排的第二个人/嚼着口香糖/盯着投影/最后一排/是一对男女/他们正见效/录像里的耳磨鬓厮//我坐在第三排/我没看录像的心情/也没有睡意/我在计划/天明的那一天路程/该如何行进”，这是“打工诗人”张守刚的短诗《通宵录像》，是一首看似朴素、简洁的生活之歌，这样的诗看似简单，但是它的简单之处也正是它的深奥之处。“打工诗人”的诗歌最重要的是表述了他个人的经验，包括他个人的内在情绪与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敏锐、鲜活感受。如郁金的《蚊子，请别叮我的脸》：“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这种貌似平淡无奇的诗句，显示了诗人对打工生活经验的真正占有。在一些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中，让人看到一种深入，即对个人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不断挖掘获得的清晰感——诗歌细节上的和主题上的。“打工诗人”对个人经验以及细微事物的处理，使我们看到诗与社会学的功能和集体主义的脱离，永远作为一个个别的说话人。如果说这类作品具有某种“时代感”，那也是在写作与语境、个人与历史的张力关系中产生的，并不是刻意而为。

最后，我还想说，“打工诗歌”同其他任何诗歌类型一样，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并不缺少艺术含量较高的文本，而是我们缺少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说缺乏发现的能力。“打工诗歌”的有力书写，都来自诗歌内部，来自那些持有更坚定的“诗本位”立场、在写作方向和方式上更自主、更具个体色彩的诗人及其作品。

“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笔谈(九)

■新作快评 王昕朋《方向》、《十月》2011年第5期

凋敝的梦想 □曾攀

中篇小说《方向》围绕着以下几对主要矛盾展开：其一是孙家与乡间邻里如赵家、韩家之间千丝万缕的矛盾牵连，赵老头子莫名其妙离世的同时，也揭开了孙家衰落的序幕。其二是老三孙得财与老二孙爱彩两人明让暗斗财政局“副局长”的归属，其中，孙爱彩手握农财股大权，却稳重公道几不徇私枉法，得人敬重；而孙得财是镇财政所所长，猴精狡诈的他却始终得不到父亲孙守田和老大孙敬财的支持，兄妹几人包括孙老头子都是各怀心事，各执一端。随之而来的则是第三对冲突，这与第二对冲突一样贯穿始终，并是使小说最后急转直下的中线线索：孙得财与孙老爷子为了宅子的朝向问题发生龃龉，前者因为听信水利局陈局长的“风水”说，要将老家宅门的方向由朝南调换成向东，好让自己如愿以偿当上“副局长”；直到被人“涂屎”之后，开始不愿“改方向”的孙守田才真正体会到了孙家的危机，动了转宅门方向的念头；然而，拆掉宅子挖见地基才知道，老家原本的朝向就是东面，这一切都瞬间变成了一场闹剧，得来的只有徒劳和幻灭。同样出人意表的还有第四对主要矛盾，那就是老大孙敬财与情人白雪的真情与诈骗，白雪机关算尽，夺走了孙敬财的数千万股权，而后者则最终家破亲散、人财两空。

从这几对相互纠葛矛盾可知，如果说老三孙得财是小说的矛盾触点、老爷子孙守田是整个文本的纽结点的话，那么大哥孙敬财和白雪则将小说推向了高潮，而水利局陈局长现身说风水和孙老头子改宅子方向的历史乃至孙得财的意外升迁，则是情节跌宕涌动的迷津和暗滩。这个过程暴露出了孙家错综复杂的地位关系和利益链条，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随着宅子的破拆，最终分崩离析，这其中寄托了作者对家族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的严峻思考。

尽管没有构成小说的核心矛盾和关键线索，但是作者在孙敬财的丈夫、县文联副主席何文学身上，其实还寄寓着很深的省思。可以说，孙老爷子的儿女们手里把着的是水山县的财脉，而赵老头子以及他的儿孙则俨然成为水山“文脉”的掌管者，然而我们

看到，这两者是近乎完全割裂的，虽然何文学是孙老爷子的女婿，但是由于他是“文脉”的代表，也与孙老爷子隔阂甚深。从何文学身上可以看出，如果文学没有了担当，反倒会成为生活的负担与时代的笑柄。小说第四至第六部分讲述何文学吃官司和借钱偿债的过程，何文学起先还与赵老头子一起毫不遮掩地以读书人的“高尚品质”自居，批驳孙守田的庸俗腐化，然而一朝落魄，则尽显读书人之尴尬疲态于无遗，很多时候更显得辛酸和猥琐。在这个过程中，金钱与精神似乎总是尖锐对立的，两者之间无法构筑起沟通的桥梁。在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背后隐约可见的，其实是财富与精神这两大社会因素从意识形态到生活现场的割裂——这也是造成财富畸形膨胀而精神却极度萎缩的重要因由。

接下来就说“方向”二字。观察孙守田及儿孙的名姓可知，从田地到钱财再到孙家汲汲以求之的“权力”、“守”的对象变了，小说对于“方向”的反思也从中凸显出来：从孙老爷子以掌舵者自居容不下权威失落，到老三孙得财觊觎财政局“副局长”之位要求祖宅大门换“方向”，再到老大孙敬财把握风向谋求自保放弃白雪以及老四孙宏财的利欲熏心与为非作歹……宗法制家庭中心、官本位与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的诡异结合，在中国城乡间演绎了一出出的闹剧和悲剧，甚至成为整个时代的症结所在。人不正心，官不正心，家不载情，甚至村里人在路上给孙守田鞠躬，都令他很不自在，怀疑他人是否心口不一。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乡村安宁静谧的历史想象。然而，孙守田等对邻居老韩家、赵老头子家的敌意，包括孙家内部的猜疑、排斥与为害，却都导致了情感上的“老死不相往来”，颇印证了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这也难怪，毕竟，极度的自我必定滋生无信任感的危机状态，而以孙家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甚至延伸到整体的国民性层面，都缺乏一种元认知式的自省意识，自我/家庭/家族中心的单向立场，永远无法从人的内部建立起反思的起点。

作者最后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孙家的老宅子”，“重建”无望，成了一片水塘，物是人非的大家族不仅没了“方向”，而且连根基都被湮没了。中国城乡发展也许会面临严峻的困境，但绝不可自溺于凋敝的梦想，相应地，如何在凋敝的现实中立稳根基，开辟出新的制度空间、生存状态与精神想象，将决定未来的“方向”。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起大的担当，文学责无旁贷，这也是小说《方向》为我们指引的“方向”。

■短评

李波的“红与黑”

□潘启雯

旅美作家李波长篇小说《我在北京有张床》（作家出版社2011年5月）描述了他出国前的“漂泊”，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故事以近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狂飙猛进为大背景，以“京漂”生涯为大舞台，以颇具黑色幽默的自述语调展开：四川某城青年戈海洋大学毕业后先后经历了失去教职（干部身份）、下岗、失恋、生意破产、连续痛失亲人等打击，在内外夹击、濒临崩溃之际，靠写作自我治疗。世纪之交，戈海洋携带三千元钱、一本下岗证和一部书稿，怀着司汤达《红与黑》中的外省人于连去巴黎时一样的心情，来到京城，以卑微之躯做“最后一搏”。

一次次变换身份和职业，一次次被抛入生活边缘。戈海洋力图汇入的所谓“生活主流”，无非是想过上正常人生活。然而，在他能到达的任何地方，生活都呈现出“真实而残酷的真相”，各种尝试的失败，都如同和风车作战，将他逼入西西弗斯的囚徒困境。极度的理想幻灭和“不成功罪”的噩梦，终究把这个“在当地颇有有名望的社会贤达”锻造为一枚“怪人”——“这个世界如果99%原本不正常的人显得正常，剩下的1%必然显得不正常”。

贫穷和落后的不平衡乃至不公平，犹如“凶恶咬尾的蛇”，令众多年轻人对世代生活的土地丧失信心，对远方的大都市充满憧憬。在他们心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际大都市就是天堂。当然，这一定程度归咎于传说中的“天花乱坠”。孰料，近年来的“北漂”、“沪漂”、“南漂”等早已失去了早年的玫瑰色光芒，正像作家徐星在《剩下的都属于你》所暗喻的那样：这世界一切资源早已“物有所主”，不容分享，“剩下都属于你”的往往是“挣扎、竞争的惨烈、体制的阻击、猝不及防的遭

际、不可名状的无力感和屈辱感……”相映成趣的是，《我在北京有张床》描述的现实世界同样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双城”无处不在：城市/乡村、东部/西部、精英/草根、体制内/体制外、户口/暂住证（居住证）、富二代/穷二代……在这片土地上，“漂们”想穿过钢筋水泥的冰冷堡垒，进入“广场般宽敞舒适、宫殿般富丽堂皇”的俱乐部，都无异于以卵击石。

历史既在狂飙猛进，也在循环往复。180年前于连的悲剧，被大被规模地复制。不难理解，尽管戈海洋有着与生俱来的一表人才、干练的野心勃勃、百折不回的“韧性”和极善自我调节的“烂滚”性格，但他折腾8年，除了一张床垫、几段爱情、半腔叹息和一桩“不成功”的罪名外，几乎一无所获。戈海洋似乎无法逃脱“剩下都属于你”的命运魔咒。

在戈海洋周围，道德坚持几成笑柄，荒谬无处不在。吊诡的是，这同时又是最好的时代——地球村时代。正当戈海洋再度“嗷嗷抓狂濒临崩溃”之际，一次午夜奇缘，戏剧人生为他量身打造了新的命运。他在一美国哥们的倾力帮助下，踏上出国之路，之后又被洋太太“收为压寨丈夫”。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没弄到北京户口，却阴差阳错地成了美国人。或许，这就是作者想表述的东西：不向命运低头。即便遭受挫折，也要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向前。

从现实世界解困，从固有秩序突围，形成了李波“有意识”的书写。尽管每挪进一步都意味着一次冒险，却步步都是生命意义的探索，并具有强烈的指向性——精神家园、生命来源、支撑、关联、疆界和归宿。小说中具象的“床”，其实是关于生命、记忆、爱欲和梦想的隐喻。

在结构上，小说别出心裁的时空闪回与穿插，既有历史回眸，又充满现实扫描和彻悟，深烙时代印痕，情感取向和个人体验；个性化的话语方式，让人在悲凉之余又不禁捧腹。这部小说，同时也成为一个独特的励志故事：戈海洋“大痴若愚”的人生态度和“福祸相依”的命运历程，或许会让那些同样漂在异乡的年轻人产生心理共振，获得某种心理抚慰。

好诗经典	诗四首.....李肇星
家居秦岭(组诗)南书堂
赫图阿拉秋色(组诗)陈松叶
肩膀上的春天(组诗)唐成茂
江南的若干心情(组诗)柯秀贤
坚强的树叶(组诗)冯连才
实力诗人方阵	
山楂树及其他(组诗)韩宗宝
春风化雨(组诗)田春雨
在凉山(组诗)胡应麟
曼陀罗(组诗)从容
小得就像一只麻雀(组诗)田力
大声喊出的爱(组诗)肖友清
苏笑嫣 王丽媛 富永杰 李王强 西北步子	
周大强 包文平 王小忠 冉小江 王向威	
孙子兵 黄恩鹏 红莲 李发明 杨卫东	
蔡克霖 张唱	
李文朝 赵京战 姚莹 王梦赓 王秀杰	
何鹤 张振新 叶春秀 李大兴	
环球诗艺	词的言说.....李天靖
品诗评潮	不能忽视“红色诗歌”的价值.....谭旭东
邮发代号	8—17 国外代号 BM5114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 邮政编码：110003